

重新認識許慎的文字發展觀與《說文》 的價值*

李守奎

摘要：《說文·叙》是第一篇漢字發展史論文，系統闡述了從文字起源到漢代文字與文字研究的發展過程。許慎具有明確的文字歷史發展觀和建構術語的認識。《說文》建立起一套自足的話語系統，古文、籀文、大篆、小篆、篆文等是義有專指的術語，有其確切的內涵，彼此明確區分，後人多有誤解。“古”與“篆”是文字發展過程中的核心要素。許慎清晰表述自前代之古文發展到西周末年，文字分為籀文和古文兩系。籀文源自古文，其字體是大篆，籀文大篆經過選擇淘汰與規範成為小篆，秦統一之後大篆、小篆並行，直到漢初還是史學童考試的內容。古文是文字的源頭，一直流傳，孔子寫經用古文，戰國發生分歧，秦始皇廢除，漢代開始復現，王莽時期受到重視，成為六書之一。許慎陳述的文字歷史發展過程與出土文獻基本相合。古文既不是戰國時期的六國文字，也不是戰國之前的古文字，而是秦系文字之外的先秦古文字，不僅《說文》重文中附錄，而且在“正字”中也大量存在。《說文解字》是應古文文獻研究需要而成的漢代古文字集大成之作。

關鍵詞：《說文解字》；《說文·叙》；古文；籀文；篆文

最早對漢字發展史進行全面闡述的是東漢時期的許慎，《說文·叙》是漢字學術史的源頭^①。許慎的《叙》是一篇經典的文字學論文，沿用或創建了一套術語，概括了文字產生與演變的歷史過程，細化了文字構形的理論，闡明了創作《說文解字》的目的與體例，成為傳統文字學的理論基礎，一千多年來被奉為漢字研究的圭臬。20世紀初，王國維創二重證據法，對《說文》中的材料詳加審核，利用出土文獻對傳統理論加以修正。“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說文》古文為戰國文字說”“正體中多古籀說”等重大發現影響深遠，有的觀點已被定為“常識”。隨着出土文字的豐富，對各個時期的文字認識日漸清晰，文字學史不再過度依賴許慎所用的

*本文承蒙黃德寬先生審閱並指正，賈連翔博士、郭偉濤博士提出修改意見，王先虎助教協助處理文檔，特此致謝。

①《漢書·藝文志·小學》雖然有文字發展的簡述，但目的主要是對所收篇籍加以說明。

術語，而是直接以歷史分期為經，以載體分類為緯，陳述描寫日益精確而充分（唐蘭，2016:317-320；裘錫圭，2013:45；黃德寬、陳秉新，2006）。在此條件下回頭重新精讀《說文》，會理解得更加客觀，更加準確。

《說文解字》十五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猶如司馬遷為中國歷史寫通史一樣，許慎也為漢字作了當時的“通史”。《說文》主要有下列幾個內容：第一，勾勒出漢字發展的輪廓。從字體演變的角度，對漢字由古文、籀文、大篆、小篆、隸書和古文到孔壁古文的廢興兩條綫索敘述文字的發展過程，建立起字體演變史的框架。今天看來，除了個別地方為了抬高古文經地位有意托古和淡化，絕大部分符合事實，許慎對文字發展史的認識長期以來被誤解或被低估。第二，明確學術研究的目的，反擊今文經學，鞏固加強古文經學的地位。第三，解字例，通神旨，開創了用六書理論闡釋古、籀與篆文的範式。第四，開啓了以歷史文獻文字為主的研究文字的學術傳統。第五，初步建立起一套由術語構成的話語系統。

本文在審視許慎所依托的文字材料、漢代文字研究狀況與創作目的的基礎上，梳理許慎所使用的術語，重新理解許慎的文字發展觀與《說文》的體例。

一、許慎文字理論形成的時代背景

作為學術史研究，我們首先需要回到文本本身，正確理解作者的本意。其次應將其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理解其意圖。最後才是立足當代學術標準歷史地看待其貢獻與不足。

許慎生卒年月不詳，東漢永元元年（89）已經完成《說文》的《叙》，安帝建光元年（121）許慎病，其子獻《說文解字》，其後不知所終。據此可確知其生活在東漢前期。這個時期所能見到的文字材料可以分為三類：歷史文獻文字、通用文字、特殊場合應用文字。許慎研究的文字是歷史文獻文字和當時特殊場合還在應用的篆文。

（一）許慎時代的文字材料與應用

通過將文獻記載與金石考古材料相參照，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了解許慎的材料依據。

1. 西周、春秋文字

《叙》之“鼎彝銘文”即古文，《漢書·郊祀志》所載鼎銘，張敞斷言其為周人所作，《禮記·祭統》所載孔悝鼎銘是春秋金文。許慎也說：“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從文獻記載看，漢代學者不僅能夠見到，而且能

够通讀和斷代。許慎當時見到多少這種“前代之古文”難以準確推究，但無論如何不能忽略不計、從其研究對象中排除。

2.《史籀》十五篇

這是漢代所能見到傳抄的先秦文字的字書。依許慎所說，是周宣王時期的太史籀所撰，字體是大篆。漢沿襲秦制，尉律規定“以八體試之”，大篆在考試範圍之內，既然考試，當有考試的範本。張家山漢簡《史律》記載對“史學童”考試的內容是“（試）以十五篇，能風（諷）書五千字以上，乃得爲史。有（又）以八體試之”。這十五篇，應當就是《史籀》十五篇，其字體就是八體中的大篆。東漢初亡六篇，許慎還能見到其殘餘。

3.搜集與“出土”的六國文獻

漢代出土和發現了爲數不少的古文經及其他古文文獻。

漢初，秦柱下御史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開其端，其後壁中書出，河間獻王等民間搜集收藏，秘府接受奉獻和搜集所得日漸豐富。這些珍稀古籍成爲秘書藏在秘府，只有少數人才得一見，孔安國、司馬遷、劉歆、賈逵、許慎等人都是以特殊身份得見秘書而有機會學習、研究古文。這些古文文獻從西漢初年到西漢末年，只是在很小的範圍內研習，在劉歆、王莽等的倡導下才得到官方的重視，在東漢成爲顯學。

漢代盜墓盛行，墓中出土古籍是情理之中事，但很少留下痕迹^①，原因是多方面的。社會對“古文”不重視，盜墓者也沒有“古文”的知識，墓中即使有竹簡也被當作廢物，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現代考古之前。

漢代的古文文獻是用戰國時期六國文字書寫的，這是王國維的一大發現^②。

4.秦人小篆

漢代學者對秦文字的具體情況已經不甚了了，許慎說漢之尉律試學僅以“八體”，這八體顯然就是他所說的秦書八體。班固所說的同條律文是以“六體試之”，而這六體却是許慎所說的王莽六書，其中有古文和奇字。秦廢除了古文，不可能再考試“古文”，顯然許慎所說比班固更加合理。小篆從籀文大篆演變而來，秦人只在印章、刻石、詔版等特殊領域使用，官府文書、民間書信等一律是隸書。許慎寫書時距離秦滅亡已近300年，秦之小篆還有多少留存難以判斷。秦系字書《倉頡篇》作爲識字課本，大部分已經轉寫爲隸書，目前出土所見《倉頡》全部是隸書文本。

①《古文四聲韻·序》：“唐貞元中，李陽冰子、開封令服之有家傳古《孝經》及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授之韓愈。愈識歸公，歸公好古，能解之，因遺歸公。又有自項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經》，亦云渭上耕者所獲。”參見曾棗莊主編（2015:117）。

②王國維在《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中云：“孔子壁中書與《春秋左氏傳》，凡東土之書，用古文不用大篆。”參見王國維（1959:305-307）。

即使有篆文的《倉頡》，代有增益，傳抄失真，到了許慎的時代，秦篆、古文、漢篆糾纏在一起，哪些是秦人小篆已經難以分辨，但秦刻石、詔版等尚完整清晰。可以肯定，許慎能夠見到一定量的秦文字。總體上說，許慎對“秦書八體”的具體情況應當有比較清晰的了解。

5. 東漢人使用的文字

東漢人使用的文字有篆、隸、草。通用文字是隸書及其俗體草書。篆書僅限於碑刻、印章、幡信等特殊場合，應用範圍雖然窄，也會發生變化，有字體的不同，數量的增減等。漢代人所創造的“篆文”經過許慎的選擇規範，也被收錄在《說文解字》之內了。

漢代通行的隸書與草書，不是許慎的研究對象。識字應用，由《凡將》《急就》等完成教學。

總之，許慎時代的基本情況是：隸書是通用規範文字，其草寫就是以文書類漢簡為代表的俗體字；秦人小篆在印章、幡信、碑刻等特殊領域沿襲使用並不斷變化；古文文獻不斷發現，不僅需要加強整理，而且逐漸引起重視。

（二）許慎時代的文字研究

漢代學者研究文字分為五個方面。

第一是古文字釋讀。

孔安國能夠以今文讀壁中書並加以隸定，司馬遷從其學。張敞好古文且能正確釋讀西周金文，劉歆能夠用壁中古文校勘經書等。漢代部分學者能夠釋讀古文字，小範圍傳承。劉歆弟子眾多，許慎就是其再傳弟子（唐蘭，2005:11）。古文字識讀方法古今沒有太大的變化，字書比對、文獻比勘、字形分析三大方法漢代學者就已經掌握^①。

第二是漢字分析理論。

許慎之前漢字理論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藝文志》承襲劉歆《七略》而來，所說“象形、象意、象事、象聲、轉注、假借”的“造字之本”的六書很可能是本之劉歆。許慎以此理論為基礎對古文與篆文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析與闡釋。

六書是從古文研究中歸納出來的“字例之條”。釋讀古文字的重要途徑有二，第一是通過字形分析釋字，第二是突破字形讀通文獻。六書之前四書是字形結構分析，假借與轉注是一字多義和多字同義的字形記錄語言的字際關係。不明象形、形聲等則不明文字之結構，無法釋讀疑難字；不明假借、轉注則不能確知文字所記錄的語言，通讀古文文獻。許慎之前，這套理論早已成型，班固、鄭眾都列出名目。

^①字書有《史籀》與《倉頡》，古文經有相對應今文經，文字分析有六書理論。

可以說六書理論是古文家共同研究古文的結果。從班、鄭、許三家名目和順序不盡相同可以看出其雖然有同一來源，但各有所記，還沒有完全定型。到了《說文》，給出義界，成為傳統文字學的理論基礎。

許慎知道六書理論的價值在於分析古文字與釋讀古文文獻。

第三是文字規範與應用。

規範的釋字課本歷代都有，先秦《史籀篇》、秦之《倉頡篇》、漢之《凡將篇》《急就篇》《元尚篇》等，都是實用的識字課本。漢代這些識字用的字書取材於《倉頡篇》中的常用字，時有補充，編成韻文，便於誦讀記憶。這是傳統識字的主要方法，後來的《千字文》《三字經》作用皆相類似。

第四是古文字的整理與彙集。

許慎之前，可能已經有學者編纂古文字字書（參看徐剛，2008:13），從《倉頡篇》的收字變化可以推斷漢代學者很可能把古文字依附在《倉頡篇》之後並不斷增補。《藝文志》記載《倉頡篇》不斷增補改編，秦人李斯《倉頡》七章，趙高《爰歷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學》七章，漢間里書師合併“三倉”，斷六十字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合計三千三百字，其中還有重複字。也就是說秦人使用的小篆規範用字應在三千字上下，這符合實際，每個時代的常用字大都是這個數量。秦人“三倉”，“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根據許慎所說，秦人的《倉頡篇》是小篆文本，是通過對籀文大篆加以選擇和改造而確定的規範實用文字。這個小篆文本最晚在漢初就有了隸書本。張家山漢簡《史律》對“卜學童”的考試內容是“能諷書史書三千字”。漢代的“史書”即隸書，段玉裁論之甚詳。這三千字應當就是隸書本《倉頡篇》中的三千多字。

根據《史律》可知，史學童要讀歷史文獻，所以要學習《史籀篇》，卜學童通用文字就够了，所以只學習三千“史書”就够了，漢代對不同職業的人文字考試的內容不同。源自《史籀篇》的《倉頡篇》有小篆和史書（隸書）兩種文本是合理的。隸書《倉頡篇》向應用的方向發展，篆書的《倉頡篇》成為學者研究的對象並不斷增補。到了西漢末年，揚雄作《訓纂》順續《倉頡》，易《倉頡》中複字，凡八十九章，凡五千三百四十字。多出的兩千多字從哪裏來？如果《訓纂篇》是篆書字體，西漢人造出兩千多“漢篆”來是難以想象的。班固續補《訓纂》，已經達到六千一百二十字，較之秦人小篆已經翻了一番。“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所增補的大都應當是古代文獻用字。自書同文以來，以小篆為代表的篆書字體從來就不是實用字體，從來沒有發現用小篆字體書寫的“六藝群書”，這些多出來的文字如果是篆文，大部分應是古文“篆化”的結果。

漢代通行的《倉頡》及各種《訓纂》類字彙是篆書還是隸書？雖然考古發現

的都是隸書文本^①，但我們不能就此否定漢代有篆書的《倉頡》系列字書存在，就像現今一樣，《新華字典》大量印行，《說文解字》也有一部分人研讀。漢代印章篆刻比現在應用得廣泛，相應的工具書就有存在的充分理由，不然我們無法解釋《說文》九千多篆文的來源。只是因為書寫困難，應用沒有隸書文本廣泛而沒有流傳下來。

《倉頡篇》從常用字識字課本逐漸向文獻字彙大全演變，性質發生了變化，功能也發生了變化。

第五是對“古文”等文獻疑難字的研究。

《訓纂》之類體例的字書大量收錄古文，就造成“《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的局面，就需要有人來研究，《藝文志》所載無名氏《倉頡傳》與杜林的《倉頡故》大概就是對篆文字書的注釋。

班固《藝文志》中列小學十家，四十五篇，是那個時代漢字研究的整體面貌，從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是識字讀本。這些著作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歷史文獻《史籀》十五篇，因為不實用不被重視，東漢初年已經亡佚六篇。第二類是《倉頡》及各種增補的《訓纂》，是秦人小篆和各種古文字的彙集。第三類是各類實用文字的識字課本。第四類是對《倉頡篇》中疑難字的研究。

表1：班固《藝文志》中的小學類著作

籀文	倉頡類	倉頡研究類	漢代課本類
《史籀》	《倉頡》		
	《倉頡訓纂》	《倉頡傳》	《凡將》
	揚雄《倉頡訓纂》		《急就》
	杜林《倉頡訓纂》	杜林《倉頡故》	《元尚》

《藝文志》中《八體六技》不注篇數，與《別字》十三篇性質不明，韋昭認為八體就是秦書八體，後人還有其他猜測，如果是書名，可能都是異體字的彙集^②。

班固死時（永元四年，公元92年），許慎三十多歲，他曾經“校書東觀”，《藝文志》所載的書，應該見過。

（三）許慎時代的今古文鬥爭

古文經書的出現，動搖了今文經學的根基。今文經學主要是政治學意識形態，漢代依托儒家經典闡釋建立起一套主流思想，為了其權威性，尊崇五經為聖人所作，

①如阜陽漢簡《蒼頡篇》、北大藏漢簡《蒼頡篇》等均是隸書書寫。

②“八體六技”不注篇名，賈連翔博士懷疑是對《史籀篇》的注釋。

一字一語都被視為蘊含微言大義。古文經從文字和文本上一旦對今文經有所否定，就會使得建構在其上的七寶樓閣轟然坍塌。今文經學家必然反對古文，漢代的今古文之爭就此展開。許慎作為古文經學家，研究文字主要是為經學服務，一方面尊重文字的事實，從整體上看，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漢字發展的歷史；另一方面，他在某些環節有意淡化甚至有意托古，刻意建立起一套提高古文經學地位的文字學理論（參看裘錫圭，2013:61）。

許慎的時代，由於古文文獻釋讀催生的古文字研究已經具備成熟的理論方法，積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古文經學受到重視，已經具備了與今文經學一爭高低的條件。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一部以古代文獻用字為中心的學術巨著《說文解字》誕生了。

許慎希望通過自己的創作達到如下目的：

編纂古籀與篆文字樣大全，是古文字考釋成果的大成，也是釋讀古文文獻的工具。

用六書理論解析每一個古籀、篆文的結構，解謬誤，曉學者，破解世人及俗儒之謬說。

確立古文的正統地位，為提高古文經地位創造理論依據。

二、《叙》——最早的文字發展史論

許慎的《叙》是最早的、也是傳統文字學中最重要的漢字發展史論文。許慎根據傳聞與所見到的材料，按照歷史發展的脈絡展開文字史的敘述。根據許慎所定下的節點，我們把它分為六個階段。

前文字階段，八卦、結繩等符號傳達一定的信息，是助記憶的手段，作為可視符號傳遞信息，與文字有相似性。漢代學者能夠判定其不是文字，這很了不起。前文字的情況應當來自傳說。

（一）古文的起源至三王階段

古文是文字的源頭，自“倉頡之初作書……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自黃帝之史倉頡造字開始一直到夏商周三王時期使用的文字，都是古文。古文之所以稱為古文，就是因為其來源古老。

《史記》敘述歷史自黃帝始，《說文》講述文字從黃帝之史倉頡始，這個古史系統淵源有自，許慎承認這個說法，但沒有見到可判定的實際材料^①，幾千年的文

^①許慎所見是否有商代的銅器銘文不得而知，即使有他也無法判定。

字發展歷史就以“改易殊體”“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一句話高度概括。

漢字的起源，直到今天還是一個只有推測、無法證實的論題。許慎在沒有材料證據的情況下，沿襲舊說，不做過度闡述，近於“實事求是”了。

許慎認識到各代文字不同，這種文字歷史發展的觀念比“父子相承，何得改易”，把隸書當作倉頡所造字的今文學家高明得多，後人認為許慎把壁中書當成了倉頡古文，實在是棄“改易殊體，七十二代靡有同焉”於不顧的曲解。

（二）西周文字，《周禮》之六書，古文之正

三王之後制禮作樂的聖人就是周公。古文學家把《周禮》定位為周公所作，緊接着就把六書理論與《周禮》相比附，這樣就使得“六書”與古文獲得正統的地位。

許慎所見西周文字材料有限。上文已經說到，漢代學者能夠見到西周的銘文，也可以讀懂。許慎所說的“前代之古文”包括一部分這一時期鼎彝上的文字。

（三）西周末年至春秋，古文與籀文並存階段

從這個時期開始，文字發展分兩條道路展開。首先是籀文的產生與發展。

班固《藝文志》記載：“《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叙》說“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進一步表達了其對籀文與古文關係的理解。

關於籀文，從許慎的表述中可以概括出如下幾點：

其一，籀文與古文的關係。古文是源頭，籀文晚出，是古文之變，與古文有所不同。自倉頡古文開始，七十二代字體改易，各不相同，“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一“及”表明與前代古文之間的聯繫，“與古文或異”則表明其與古文的不同。

其二，籀文的時代與出處。宣王太史籀所著書班固稱之為《史籀》，東漢初年，十五篇已經亡佚六篇，許慎所見只能是殘存九篇，書中文字收錄在《說文解字》中就是籀文，例如卷一之“旁”：

旁 溥也。从二，闕；方聲。𠂔 古文旁。𠂕 亦古文旁。𠂖 籀文。

其三，籀文與大篆的關係。“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表明了史籀、籀文與大篆是作者、書名、所收字字體之間的關係，就像後代段玉裁、段注、段注篆文一樣，在不同的語境會有不同的稱謂，所指可以相同。籀文的字體是“大篆”，並不是所

有的大篆都是籀文。籀文是特指《史籀》這部書中的大篆，大篆這種字體一直延續使用，“書同文”之後還是學習考試的內容。

王國維在全面系統疏證了每一個《說文》籀文之後，得出籀文是戰國時期秦文字的結論，引發後續爭論。許慎認為籀文是西周末年的周文字，是秦文字的源頭。從文字發展史的角度看，這兩種說法實質上相去並不很遠，後面還有詳論。

文字發展的第二條道路就是古文的沿襲。

文字的發展並不是演變成籀文之後，古文就消失了，而是發生了地域分化。古文在有的地方變化為籀文大篆，有的地方還在沿襲使用。“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孔子、左丘明等距離周宣王時代已遠，書寫經傳還堅持用“古文”，不用籀文。許慎似乎給古文以正體的地位，自倉頡、周公、孔子、左丘明一路下來，儼然是正統。古文學家設定孔子、左丘明等用古文寫經傳，這些文本就具有了更高的地位。許慎也是古文學家，自然接受並維護這樣的說法。

（四）戰國，文字異形階段

孔子之後就進入戰國時期，“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戰國時期，古文發生了巨大變化，列國文字各有不同。所謂的“文字異形”，主要是指古文發生了嚴重的地域變異。文字如何異形，許慎沒有明確交代，致使後世多誤解。

許慎實際上已經把“七國”文字分為兩系，一是秦文字，由史籀大篆到小篆自成一系，一直沿襲到漢代，發展脈絡清晰；二是後來被秦廢除的六國文字。

許慎並沒有割裂六國文字與古文之間的聯繫。這些文字雖然異形，但必有其源頭。戰國之前，文字的源頭有兩個，一是籀文大篆，二是沿襲的古文。秦文字的源頭是史籀大篆，六國文字不同於秦文字，其源頭自然是古文。許慎明確說古文在秦始皇統一文字和隸書興起之後才滅絕，那戰國期間六國使用的文字必然是發生變化了的古文。

許慎確實淡化了六國文字，他為什麼這樣做，詳見下文第四節。

（五）書同文至廢挾書令前，古文廢絕，秦書八體獨行階段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書同文字”，至漢惠帝三年（前129）挾書令廢除期間，古文廢絕，秦文字獨行天下。

《叙》：“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

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許慎對秦文字的淵源演變，表述得非常清楚。古文演變為籀文，籀文與大篆是同一種字體，從來源說，籀文是太史籀所編的字書中的文字，大篆是包括籀文在內秦人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前所使用的文字。李斯等人對籀文與大篆加以取捨規範後就是小篆。這個秦文字發展過程顯然比把籀文限定在春秋或戰國某一個時期更完整也更接近事實。

“秦書八體”可以概括為三類：大篆、小篆和隸書。大篆是秦曾經使用過的文字，是歷史留存的秦文字。小篆是在大篆基礎上的調整規範，大篆與小篆的關係很像當今的繁體字與簡化字。當時實行的是文字“多軌制”，三種字體並行，各有其應用場合。學習大篆，或是為了讀秦人的“古文獻”，或在廟堂文化特殊場合使用。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等是不同場合、不同載體上的秦文字變體。

這一時期法律嚴苛，秦文字獨行，小篆與隸書成為規範用字，古文廢絕。

（六）挾書令後古文復現，文字應用與文字研究分離階段

漢初沿襲秦文字，秦書八體是漢初取用史官的考試內容之一。自漢惠帝廢挾書令之後，古文文獻不斷出現。北平侯張敖首獻古文《春秋左氏傳》，河間獻王也搜集了大量的古文文本，武帝時期，壁中書大發現，其後古文文獻間或出現。

西漢末年，古文受到學者的重視，到了王莽時期，部分古文經過整理，成為官學，古文也成為字體“六書”之一。《叙》曰：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將秦書八體與王莽六書比較，就會清晰看到二者之間的差異：

表2：秦書八體與王莽六書

		大篆	小篆	刻符	蟲書	摹印	署書	殳書	隸書
古文	奇字		篆書		鳥蟲書	繆篆			佐書

六書與八體之間有兩個最大的區別，一是多出了古文、奇字，二是對秦人篆書系統加以合併。

許慎對古文、奇字的時代與範圍進行了比較明確的交代：

奇字即古文而異者。

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這與王莽六書之古文專指壁中書顯然不同。古文是先秦秦文字以外的鼎彝銘文、壁中書、民間藏書等古文文獻中的文字統稱。也就是秦系之外的所有先秦古文字。

篆書很可能是先秦以來秦文字篆體文字的總稱。大篆、小篆、刻符、殳書、繆篆之外的摹印以及漢人造的一些篆體字字體差異很小，一律合併為“篆書”。《叙》所說的“篆書即小篆”應當是字體對應關係，而不是八體中的小篆專稱。

許慎把研究對象鎖定在以古文與篆文為主的文獻用字上。

三、以“古”與“篆”為核心概念的話語系統

傳統學術往往不重視術語的使用與規範，語文用語與術語界限沒有嚴格的區分，致使不在同一個話語系統中使用同一個詞語，各說各話，爭論不休。《叙》是第一篇系統的文字學論文，用今天的標準看，初步具備了術語化的概念系統。其中“古文”與“篆文”是兩個核心概念，也是相對立的概念，表達了許慎對文字發展的宏觀認識。

王國維（1959:305-307）、胡小石（1995: 394-526）、商承祚（1983）、徐剛（2008:1-26）、張富海（2007）、張學城（2018）等學者對“古文”都作過系統的梳理，各有所得，觀點不盡相同。許慎的觀點是成系統的，我們回到文本本身，《叙》中十次論及“古文”，按照許慎所理解的時代順序，列次如下：

- （1）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 （2）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
- （3）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 （4）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 （5）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
- （6）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
- （7）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
- （8）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

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

（9）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豈不悖哉。

（10）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古文”漢人經常使用，但具體所指不一，涉及文字、文本、學派等多個方面。從文字的角度說又有“古文”“古字”“古文字”等不同的稱謂，從指稱古代文字這個意義上來說，大致相同，但又有範圍大小的區別。

漢代以後，古文又有所擴展。漢代學者就開始編輯古文字書，例如衛宏的《古文官書》，如此，古文的形態就有文本原樣、字書傳抄和隸定成史書（隸書）三種形態。文本逐漸消失，隸定收入字書，傳抄古文成為獨立的學問。好古之士用古文創作，字不夠用，又模仿古文的筆法造新字，這些字也被視作“古文”。

《漢書·郊祀志》載“張敞好古文字”，能够讀西周鼎銘，雖然謙虛“臣愚不足以迹古文”，這裏所說的“古文”與“古文字”是包括西周文字在內的先秦古文字（徐剛，2008:1-2）。《藝文志》說：“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班固的意思是用“古字”書寫的文本就是古文經籍。王國維有《史記所謂古文說》《漢書所謂古文說》《說文所謂古文說》等詳加梳理，得出“（《說文》）全書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當無出壁中書及《春秋左氏傳》以外者”的結論，當今學者認為“漢代人所見到的以孔壁中書為代表的‘古文’，其實是戰國時代東方國家的文字，今天幾乎已經成為常識了”（徐剛，2008:1）。用漢代人不同的理解或者用我們今天的常識去讀《說文》，都不能正確理解許慎，我們需要把許慎的“古文”“篆文”等作為許慎話語系統的“術語”去理解。

《叙》中“古文”都是指古文文本中的文字。許慎認為，古文是倉頡造字，世代沿襲，到西周末年分化籀文大篆一系，在山東六國一直沿用到秦始皇書同文之前，來源古老，不斷變化。他對古文加以歷史分期。三王之前的古文“叵復見遠流”，無法詳知；西周以“六書”教學，厥意可得而說，鼎彝銘文即“前代之古文”；孔子壁中書承襲古文正統，即孔氏古文；戰國時期文字異形，古文變異；秦書同文，古文滅絕；漢代古文復出，古文經學興起。關於《說文》的“古文”，有幾點需要澄清。

第一，《說文》中許慎所說的古文，不限於壁中書和《春秋左氏傳》。

王國維為了強調壁中書等是戰國文字，認為《說文》古文就是壁中書與《春秋左氏傳》，既有悖於許慎的原意，也不符合事實。按照許慎的理解，古文是文字的源頭，代有傳承和變化，鐘鼎銘文是孔壁古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主要是指這些古文彼此相似，或許也暗示與孔氏古文相似。這些前代之古文，《說

文》收入書中，以第一卷為例，可判定的古文22個，其中幾個字顯然是戰國以前的文字：

表3：《說文》古文中的“上”“下”“王”

《說文》古文	春秋以前	戰國
上：段改“二”	 上曾太子鼎 集成2750	 中山王方壺 集成9735
下：段改“二”	 曾字游鼎 集成2757	 司馬成公權 集成10385
王： 	 柞伯簋《文物》1998（9）  者刃鐘 集成122	 中山王鼎 集成2840

可以確定《說文》上、下、王古文是戰國之前的文字。另外，帝、示、折等字的古文也多見於商周的甲骨文、金文，六國文字不見或罕見。這一點很多學者都已指出。

第二，《說文》古文不同於王莽六書之古文。

王莽六書古文特指壁中書，另有“奇字，即古文而異者”。漢代的古文文獻，不僅有壁中書，還有大量其他來源。壁中書古文之外的其他文獻用字與壁中書或有不同，或許這些就是奇字的來源，二者差別不會太大，相同者居多。《說文》只收錄了兩個“奇字”，其他相同相近的文字都併入古文與篆文了。

第三，許慎確知六國文字是古文。

段玉裁注《說文》云“凡言古文者，謂倉頡所做古文也”（段玉裁，2013：1）自是曲解，徐剛所說“許慎認為古文是自倉頡的時代一直到戰國之前使用的文字”（徐剛，2008:3），與許慎所說也不盡相符。古文滅於秦，原因有三。第一，七國文字異形，秦始皇書同文，“罷其不與秦文合者”，這個“其”指代的是秦文之外的文字，因罷而廢，不與秦文相合的古文絕矣。六國文字與秦文字相同的合併，不同的廢除。第二，秦人燒滅經書，滌除舊典，部分古文文獻或藏於秘府，或藏於民間。用古文書寫的經籍文獻大都消失不見。第三，隸書出現，即使有個別流傳下來的醫卜種植等實用古籍也被隸書轉寫。這些許慎都交代得很清楚。孔氏之後到秦廢古文之前的戰國時期，使用的是古文，許慎沒有明說，但不等於不知。

第四，《說文》的古文不是“廣義的古文”。

王國維（1959:314）認為：“《說文解字》叙言古文者凡十見，皆指漢時所存先秦文字言之。”學者多沿襲其說，徐剛（2008:1）稱之為“廣義的古文”，“廣義的古文，也就是古文的本義，泛指秦統一前的文字”。漢代其他一些學者或許如此認識，在許慎話語系統中作為術語，與篆文對立，是除去籀文、大篆等秦系文字之外的先秦文字。

在許慎的古文理論中，把孔壁古文與孔子聯繫起來，稱作孔氏古文以及淡化六國文字，是別有用心，下文第四節詳論。

篆文也是一個核心概念，與古文相對立。“篆”特指秦系文字，相關的概念有籀文、大篆、小篆、篆書、篆文：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

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秦書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莽新六書：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叙》中秦文字已經是獨立一系。秦文字的直接源頭，是以籀文為代表的西周文字。秦文字自成系列，由籀文大篆而小篆隸書，與六國文字的由古文而分裂而滅絕完全不同。關於“篆文”相關概念，也有幾點需要澄清。

第一，小篆是籀文大篆的選擇淘汰與規範。

關於籀文，如前文所論。這種大篆字體一直沿襲使用到小篆出現之前，也就是說春秋戰國時期，秦人使用以籀文為代表的大篆，說戰國秦人使用籀文或大篆，皆無不可。如果《史籀》是秦人沿襲使用的識字課本，就會像《倉頡篇》一樣歷代增補，成為一部秦人的識字用書，從這個角度說秦人用籀文也無不可（王國維，1959:305-307）。籀文大篆經過不斷增補，數量可能就是張家山漢簡《史律》所說的十五篇、五千字。

“小篆”是秦文字概念，班固又稱“秦篆”，特指《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三倉”。《藝文志》：“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復異，所謂秦篆者也。”“多取”即不皆取，大部分取自《史籀》，一部分是續補。漢間里塾師合併三倉，合計三千三百字，其中還有重複字，也就是說秦人實際使用的小篆也就三千字上下，淘汰掉《史籀篇》中近兩千字。秦人“三倉”，應該是當時的實用文字。

第二，小篆、篆書、篆文是不同時代的篆體文字。

許慎明確說“小篆”是秦文字。“篆書”是王莽時期使用的概念。篆書字體沿襲小篆，但字數已經遠超秦人小篆了。據《藝文志》所載，揚雄《訓纂篇》順續

《倉頡》，易《倉頡》中複字，凡八十九章，凡五千三百四十字，較之秦人三倉多出了兩千多字。揚雄與王莽同時，所謂“篆書”或許就是指《訓纂》為代表的這些文字。

“篆文”是許慎所使用的概念，是許慎見到的文獻字書中和時人使用的篆體字的總稱。《說文》中重文只說“篆文”某，與《叙》中“小篆”等嚴格區分。《說文》中“篆文”有三個來源，主要是前代字書與篆文文獻，經漢人把一些隸書、草書加以篆化形成的漢篆和經過許慎規範化獨創的篆文。

從先秦大篆、秦人小篆直到包括漢篆在內的篆文雖然從字體上說並無太大的變化，但來源、數量、個體結構等有很大的不同。

許慎建立起歷時的概念系統：

倉頡—三王	西周	西周末	春秋	七國	秦	漢	新	《說文》
前代之古文——			孔氏古文—六國異形	廢絕—古文	古文奇字	古文奇字		
		籀文（大篆）——	大篆——	小篆——	篆書——	篆文		
					隸書——			

許慎的概念與歷史敘述是清晰的。只要我們正確理解《說文·叙》，就能够得出西周末年之後，西土秦文字與東土諸國文字分別發展，秦文字發展成為篆文，六國沿用古文的結論。

周宣王時期已經是西周晚期，幽王滅國，進入東周，王室衰落，走向分裂，文字也開始發生一定程度的分化。西土秦人繼承了周人的文字傳統，規整方正，自成一格。驗之以秦人文字，從西周末年的不其簋銘，到春秋時期秦公鐘鐃，到戰國時期的商鞅量，到秦始皇時期的詔版，一脈相承，許慎將其分為籀文大篆和小篆兩個階段，與歷史事實相符。

進入東周，山東諸國文字各自發展。郭沫若編纂《兩周金文辭大系》，東周按國別編排反映出這種歷史事實。到了戰國，秦文字之外的六國變化尤為劇烈。許慎沒有強調戰國時期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但這種認識在其理論框架之內。

王國維在戰國文字研究方面貢獻很多，其最大的貢獻是指明孔壁古文與《春秋左氏傳》是戰國文字。王國維根據有限的戰國材料就能够推斷出是戰國文字，去古未遠的許慎見到的材料不會比王國維少，怎麼會把它定為“孔氏古文”，並且在書中頻頻引用偽“孔子曰”呢？

四、從觀念出發的別有用心的托古

古文學家把古文經判定為孔子所書，不一定是學識問題，而是意識形態作祟。

漢代的統治者依賴儒家經典闡釋建立起一套思想體系。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修訂六經，周孔就成了正統的代表。

古文學家努力營造三個正統：

第一，文字理論“六書”依托《周禮》之“六書”。《周禮》是周公之禮，“六書”是《周禮》之六書，自然就有了不可撼動的地位。

第二，古文是文字的正統。古文是文字的源頭，籀文“與古文或異”，成為秦人使用的大篆小篆，是古文的支流。孔子言《詩》《書》用“雅言”，書六經用“古文”，孔子所言所書，理所當然是正統。孔子因為用古文，所以“厥意可得而說”。所謂“厥意”，大概暗示用周公所定六書分析文字，可得聖人之意。

第三，古文經是經書的正統。孔壁古文經是從孔子舊宅所得，《春秋左氏傳》是孔子弟子左丘明所作。是聖人手筆或親炙聖人者所作，自然就比輾轉傳抄的今文經更加正統，更有價值。

《說文》中兩淡化：

第一，淡化六國文字。六國文字已經是分裂變化的古文，難成正統，如果把孔壁古文說成是戰國文字，會降低這些經書的權威性。

第二，淡化古文經之外的其他古文文獻。王國維等人已經從文獻記載中梳理過漢代的其他古文文獻，以今天出土簡帛來看，經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還有大量的其他文獻。古文家包括許慎都儘量避開不提，原因是不好把這些文獻與孔氏聯繫，會動搖“孔氏古文”的地位。

根據學者的研究，《說文》之六書是古文經學家建立的文字學系統（唐蘭，2005:11），與《周禮》之六書無涉。孔壁古文與春秋時代的文字無涉，是戰國文字（王國維，1959:305-307）。左丘明與孔子弟子無涉（王國維，1959:314-317）。這些謬誤是出於政治需要還是由於見識所致難以論定，但抬高古文經學的地位也是許慎的願望，師承前說，也就在情理之中。

古文經學作為一個學派，逐漸遠離意識形態，在文字釋讀與文本整理、工具書編纂等方面顯示出自身的特色。

《說文》一書，不論是文字學理論還是具體的文字闡釋，都糾纏於經學觀念與文字材料的矛盾中。從材料出發就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從其觀念出發，就會出現有悖事實的選擇判斷與“創新”。

五、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王國維對“今叙篆文，合以古、籀”有非常精闢的見解。在段玉裁篆文與古

籀多相合的基礎上，特別指出“有古、籀而無篆文，古、籀爲正字”例：

若夫古、籀所有而篆文所無，則既不能附之於篆文後，又不能置而不錄，且《說文》又無於每字下各注此古文、此籀文、此篆文之例，則此種文字必爲本書中之正字審矣。（王國維，1959:319）

王國維所見古文非常有限，但讀書之細，見解之精令人驚嘆。近百年的發展，所見日多，研究日深，商文字、周文字、戰國文字，秦文字、漢文字都成爲專門之學，可證王氏此論之精確，逐漸得到學者的認同（參看趙平安，1999）。目前已經逐漸具備對《說文》字頭剝離的條件，我曾經舉例性地指出過一些，還可以全面加以梳理。

《說文》“正字”很複雜，用許慎的術語表達包括：

1. 秦人小篆。
2. 小篆之後發生變化或新造的篆文，例如非（裘錫圭，1993:34-50）、也（李守奎，2021）、卯^①。
3. 可辨識的古文或籀文，變例。例如上、下（段玉裁，2013:1-2）。
4. 與篆文相同的古文、籀文，例如一、二、三。
5. 沒有篆文對應的古文或籀文，例如𠂔、𠂔、𠂔等（李守奎，2016）。

參照當今沿用《說文》體例編排的古文字字編，就可以充分理解字頭的複雜情況。

前文已經叙及許慎之前，秦人《三倉》經過多次增補，所增補的文字多古籀。古文、籀文與篆體文字合併由來已久。

王國維指出：“揚雄《訓纂》亦只五千三百四十字，而《說文》正字多至九千三百五十三，此四千餘字，許君何自得之乎，曰必有出於古文籀文者矣。”叙篆文，合古、籀不始於許慎，西漢時期的揚雄《訓纂》就開始了。

《史籀篇》中的文字經歷了增補、刪節和收入他書的過程。作爲一部識字課本，秦人不斷增補，是先秦秦人學習大篆的依據。李斯等對籀文大篆加以選擇淘汰，選出三千多字或頗省改，編成秦人《三倉》，成爲當時實用識字課本。從《訓纂》開始或許更早逐漸脫離實用，《倉頡》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史籀篇》中的那些被淘汰的文獻用字很可能又逐漸被收錄到《倉頡》類字書中，進一步降低了《史籀篇》的價值，所以東漢初年就開始亡佚。許慎九千多字，應該是包括了他所能見到的所有籀文而不限於重文中的籀文。

《藝文志》記載揚雄作《訓纂》：“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

①關於此字的討論可參看李守奎待刊文章《古文字視野下的〈說文解字〉》。

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這些小學家所記之字從哪裏來？

《訓纂篇》收字的標準是“有用”，所謂“有用”，很可能是超出日常應用，對研究古文經籍有用。

《倉頡訓纂》和班固增補的《揚雄倉頡訓纂》之外，還有杜林也有《倉頡訓纂》，應當也是續補文字之書。這些續補之書對古文籀文的收錄範圍逐漸擴大，《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是其集大成。

如果揚雄、班固等把古文籀文附在倉頡之後，實際上已經形成“今叙篆文，合以古、籀”的事實，許慎只是把已有的成果依例收錄，有所續補罷了。

《說文》所說“篆文”的範圍，不僅比秦人“小篆”多，也比西漢末年的“篆書”數量多。

每個時代實際應用的文字數量基本上相同，三千常用字大致够日常應用，五千字可以讀大部分文獻，九千字就是爲了研究而搜集的大全了。把古文字收入字書使字量暴增，歷史上有兩次，一次是《說文》收入古文籀文，另外一次就是《集韻》收入大量的隸古，都是爲了存古求全。

結語

王國維在一百年前，根據有限的地下之材料，詳細梳理文獻記載，縝密推斷，發千古之覆，開創了戰國文字與《說文》研究的新局面。現今我們所見材料極大豐富，對漢字發展認識日益清晰，回首經典，對傳統文字學第一篇，也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學論文精心研讀，會對漢代的文字學有更加全面的認識。

《說文·叙》是第一篇漢字發展史論文，系統闡述了從文字起源到漢代文字的發展。許慎具有明確的文字歷史發展觀。

《說文》建立起一套自足的話語系統，概念術語化，有其確切的內涵，彼此明確區分。

“古”與“篆”是文字發展過程中的核心要素。許慎已經能够區分西周末年以來，文字發展分爲秦與六國兩系。主幹是古文，支流是籀文大篆，古文到了戰國發生分歧，找不到主幹了。

許慎所說的古文，既不是壁中書爲代表的戰國文字，也不是先秦文字的統稱，而是先秦秦文字之外的古文字。《說文》十四卷中的古文須如是觀。

許慎所說的篆文，不限於秦人小篆，而是包括未納入小篆的籀文、已經被篆化的古文、漢代創造的篆體字和許慎自己加以規範的篆體字的總稱。所以有必要區分“秦人小篆”與“《說文》篆文”兩個概念。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並不是以小篆爲正字，以古、籀爲依附。最初是在秦人小篆後面續補籀文、古文等，可以理解爲小篆與古、籀合併。《說文》合以古、籀的主體就是這些文字，在字頭中有大量的古、籀。

許慎在觀念上並沒有以小篆爲正體。許慎觀念中以古文爲正，以籀文爲異，這既是漢代學者對秦文化的否定，也是爲了提高古文經地位的需求。但事實上漢文字是秦文字的繼承，又不得不以小篆爲樞紐聯繫古今。

“厥意可得而說”的主要是古文，以六書闡釋文字，主要對象是古文。壁中書是六國文字，與“前代之古文”之間的差異比秦文字與前代之古文差異要大得多。許慎的主觀觀念與事實相矛盾，在文字選擇時儘量選擇那些與秦文字相合的古文，變化劇烈的“異形”很可能有意淘汰，或附着於後不加說解了。

許慎等把六書與《周禮》相牽聯，把壁中書定爲“孔氏古文”，把六國文字和其他古文文獻淡化都是同一個目的：提高古文經學的地位。許慎不僅是在所見材料與已有研究成果上建立起文字發展理論，也受到意識形態與現實鬥爭需求的制約。

《說文解字》是一部篆文與古籀的總匯，類似今天的“古文字字編”，意在存古解古，所以當時通行的隸書、草書不收。許慎雖然有文字的歷史發展觀，但《說文解字》一書中並沒有充分體現，這就導致後人產生以古文爲倉頡造字，以九千多字爲秦人小篆等許多錯誤認識。在厘清《說文》體例的基礎上，以今天所見的材料，對《說文》可以進行更充分的研究。

第一，《說文》中“前代之古文”研究。

這一部分數量較少，主要是受制於許慎所見不多，可用材料太少。

第二，《說文》大篆與小篆研究。

這實際上就是秦文字研究，可以分爲兩段：西周末年至書同文之前，大篆時期；秦統一之後至秦滅亡。前後比較，可以看清大篆與小篆之間的區別，也就是秦始皇文字規範成果的體現。目前已有豐碩的成果，尚可進一步深入細化。

第三，《說文》中的六國文字研究。

《說文》中六國文字有三個來源：其一，漢字中有一部分常用字，從古到今沒有太大的變化，古、籀、篆一致。其二，字頭中有些字文獻不見使用，見於六國文字中，參以其他證據，可以確定是戰國文字。其三，重文中的古文等戰國文字。全部梳理，或可見漢代學者所見六國古文的概貌。

第四，《說文》中漢代篆文與《說文》改篆研究。

篆文漢代還在應用，不少字形來自隸書篆化或草書篆化，《說文》歷經傳抄，不少字形前不合古、籀，後不合漢代的篆、隸，也可以作專題探討。

上述問題大都已有學者指出並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如何細化深入，值得進一步思考。

參考文獻：

-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1962 《漢書》，中華書局。
- [漢]許慎撰 [宋]徐鉉校訂 2013 《說文解字》，中華書局。
- [清]段玉裁 2013 《說文解字注》，中華書局。
- 胡小石 1995 《胡小石論文集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 黃德寬 陳秉新 2006 《漢語文字學史（增訂本）》第2版，安徽教育出版社。
- 李守奎 2016 《漢代的文獻整理與文字研究》，《華夏文化論壇》第15輯。
- 李守奎 2021 《從觀念出發與從材料出發的漢字闡釋——以“也”及其所構成的文字為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06期。
- 裘錫圭 1993 《秦漢時代的字體》，《中國書法全集·秦漢刻石卷》，榮寶齋出版。
- 裘錫圭 2013 《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商務印書館。
- 商承祚 1983 《說文中之古文考》，原載1934-1940《金陵學報》。
- 唐 蘭 2005 《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
- 唐 蘭 2016 《古文字的材料·甲·材料的類別》，《古文字學導論》，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國維 1959 《〈說文〉所謂古文說》，《觀堂集林》，中華書局。
- 王國維 1959 《說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說》，《觀堂集林》，中華書局。
- 王國維 1959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觀堂集林》，中華書局。
- 徐 剛 2008 《古文源流考》，北京大學出版社。
- 曾棗莊(主編) 2015 《宋代序跋全編》，齊魯書社。
- 張富海 2007 《漢人所謂古文說》，綫裝書局。
-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2001 《張家山漢墓竹簡》，文物出版社。
- 張學城 2018 《〈說文〉古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 趙平安 1999 《〈說文〉小篆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
- [清]朱彬撰 饒欽農點校 1996 《禮記訓纂》，中華書局。